みんぱくリ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

From Chinese Overseas Groups to National Groups : The Trabsi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 in Mauritius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03-2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夏, ☒☒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9527

河合洋尚・張維安編『客家族群與全球現象』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　150:83-102(2020)

从侨居团体到国民团体
——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的变迁

From Chinese Overseas Groups to National Groups:
The Trabsi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 in Mauritius

夏　远鸣
XIA Yuan-Ming

Abstract: In history, there were three main groups in Mauritius: Fujian people, Nanshun people (people in Nanshun and Shunde) and Hakka people.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economy, a Chinese society with Hakka as the main body was gradually formed. Though it was a very small Chinese society (with resident population of less than 20,000), it had its own associations, schools, newspapers, cemeteries, and so on, among which the number of associations was very impressive.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Hakka society in Mauritius were related to the conflict of historical ethnic group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and economy. They we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Now, the new generation of Hakkas in Mauritius is continually moving to Europe and America, and Mauritius has become a new homeland of Hakka people.

“华人社团”是指“生活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侨、华裔，为达到一定目标、按一定原则自行组织起来的、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合法团体”（李 1995：4）。它与华校、华文报刊构成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华人社团是窥探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许多华侨华人研究都是从华人团体入手（李 1995：14-21）[1)]。

毛里求斯华人社团众多，这是毛里求斯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据统计，早在上世纪30年代，毛里求斯的侨团数最就达72个，占非洲当时侨团总数的近60％（莫 1930：49）。所以要观察毛里求斯华人社会，社团无疑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从技术的角度而言，社团是保存华人社会文献资料最为集中的场所，也是华人社会消息汇聚之地，对于研究者而言，便于材料的收集。

正因如此，海外华人社团的研究成为侨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中国大陆地区，最早系统对海外华人社团进行综合研究的是李明欢教授，她出版于1995年《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一书中全面的介绍与研究海外华人社团，对海外社团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 1995）。现在有关海外社团的著述已经蔚为大观。例如，在“爱学术”网输入“华人社团”，可以检索到数万条信息。

具体到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也有诸多学术成果。首先是有关非洲的侨史著作，如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史》，专门开辟章节来介绍毛里求斯华人社团。方积根的《非洲华侨史料

选辑》中也有关于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的史料。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关毛里求斯社团探讨的文章问世。林金枝的《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对于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有介绍（林 1995：36-40）；梅显仁：《非洲华人社团的变迁》也涉及到毛里求斯华人社团部分（梅 1997：42-43）；最近有关毛里求斯社团研究是段颖的《跨洋流动、地方适应与中国联结——毛里求斯华人社团与社会探析》，该文从社团组织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毛里求斯华人社会的跨洋流动、文化适应与地方化进程（段、陈 2017：92-104）。这些文章对于毛里求斯社团的研究，都是本文再研究的基础。

在海外华人社团研究方法上，有的从历史学角度入手，有的从人类学的角度入手（李 1995：14-15）。本文主要从历史学的方法，通过对社团变化的考察，来探讨华人社会的变迁的背景。

本文根据笔者两次在毛里求斯的调查以及对归侨的访问的基础上撰写而成。2011年、2018年，笔者两次前往毛里求斯做田野调查，收集了较为丰富的文献与口述史资料。同时还在国内利用现代便捷的现代通讯技术（微信、SKYPE）对报告人进行补充访谈。

1 毛里求斯华人移民历史与概况

毛里求斯位于印度洋西南部，是一个充满热带风情的岛国，面积2028平方公里，由三条火山山脉组成，沿海平原向北展开。毛岛面积虽不大，但居战略位置，素有“印度洋之星与钥匙”之称。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毛岛首都路易港是联系欧、非、亚、澳四洲的海上交通枢纽。这个与中国远离万里的岛屿，至少从18世纪起便有华人移居此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后，1860年，中法、中英《北京条约》签订，新条约规定，公民可以合法移民。另一方面，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殖民政府逐步放宽移民入境的限制。1862年、1865年英国殖民政府两次颁布法令，放宽对外国移民的限制。到了1877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移民法，取消外国移民入境须事先经过批准的规定，并免除移民的保证金，此之谓1877年移民法（周主编 1993：127）。在这项法令之下，大量华人开始移入毛里求斯，其中包括福建人、南顺人（南海顺德人）、梅县客家人。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为客家人移民进入毛里求斯的高峰期。二十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华人内部族群人数的消长变化，南顺人、福建人比例降低，客家人数量大增，占毛里求斯华人总数的90%，所以毛里求斯的华人社会以客家人为主，这是毛里求斯华人社会的一个特色。上世纪80年代，华人数量达到高峰，大约有三万多。

2 毛里求斯传统华人社团

与世界其它地方一样，毛里求斯华人移民在处理生死贫病诸多问题上，需要一些社会组织与场所提供帮助，这种需求促成了社团的产生。早期传统社团包括关帝庙、南顺会馆、

仁和会馆以及各姓的宗亲会。

2.1 关帝庙

毛里求斯最早的华人社团是关帝庙。传统海外社团，往往是以寺庙为依托而建成，另一种是借助秘密会社而成立，但毛里求斯关帝庙则是二者兼而有之。在毛里求斯，最早的华人社团是以关帝庙为依托而成立的组织。

（1）关帝庙的创建与头人制度

在毛里求斯华人社会中，最早站稳脚跟的是福建人。19世纪初来到毛里求斯的福建人陆才新，是当时华人社会的领袖。陆才鑫被总督接受为移民的保人，并允许他自费前往中国带移民回来。1822年到1826年，陆才鑫带回五名中国人，并由此建立自由移民的渠道。到了1850年前后，毛里求斯大约有一千名中国人。陆才鑫也因此被认为是毛里求斯华人社会之父。

为提供一个空间来给华人活动，1839年，陆才新向英殖民当局请求土地建关帝庙，得到批准。关帝庙的建设由福建、客家、南顺三个族群一同参与，落成于1842年。这所关帝庙所在地点为拉沙鳞，所以称为拉沙鳞关帝庙；又因其建在海边，故又称“海唇关帝庙”。关帝庙神灵是从福建东山岛关帝庙分香而来（刘 2012：210）。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陆才新邀请全岛华人来祭拜，然后再举行聚餐、赌博等活动，以增进乡谊（李 1996）。

关帝庙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准行政机构，它不仅仅是祭祀聚会的场所，也是一个调解纠纷的仲裁场所与救济的角色。陆才鑫无疑是关帝庙的主持者，也是当时华人社会的头人，他在华人社会中建立起一套基于家长制基础上的管理制度。

至于陆才鑫主持建立的关帝庙的性质，目前研究者一般少有探讨，但仍有一点蛛丝马迹可以追寻。关帝庙内有一块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残损碑文，其名曰“□□公司碑记”。尽管正文内容已经残损不可辨识，但通过碑名上的“公司”二字可以推测，这个会馆的建

照片 1　关帝庙（2018年 8 月，笔者拍摄）

立与当时秘密社会有关。另一块同治五（1866）的碑额，名为“忠义堂公司碑记”。这种被称为“堂”的机构，往往也与秘密社会有关。

（2）头人制度的破坏

到了19世纪末，福建人数比例降低，南顺移民数量增多，他们于1859年成立了“南顺会馆”。随着19世纪后期客家人的大量移民涌入，客家人的势力加强，并且于1871年建立了仁和会馆。尽管客家与南顺人都建立了自己的社团，但依然是头人制度维持着整个华人社会的秩序。

大约1874年，陆才新回到了中国福建，并在家乡去世。陆才新去世后，南顺人阿方·唐文（Affen tank-wen）成为当时华人社会的领袖。1900年6月，阿方·唐文去世，华社需要重新选举头人。人口已占多数的客家人想要占据这个位置，遭到南顺人的抵制。

关帝庙领导权之争除了族群之间的矛盾外，还有来自国内的政治影响。晚清时期，国内的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发生争论，形成两派意见，这种思潮也延伸到了毛里求斯，各派在毛里求斯都有自己的支持者。

关帝庙领导权经历数之争年而不得结果，各派首领决定将争议提交最高法院。1906年6月21日，最高法院作出了“萨洛蒙裁决”。该裁决把关帝庙的领导权平均分配给华人三大派代表，即每年轮流领导关帝庙。首领的绝对权力移交给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广州派、客家派和福建派各出5人出任董事成员。这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不过现在每个族群的董事增加到7人[2)]。这样一来，原来由某个头人领导的制度便废除了，而是采用了一种联合选举制。在这种制度看似公平，却导致了华人社会的分裂。因为这种联合选举组织再也不能要求各个族群必须服从谁了，而是互相制衡，从而各派之间的争斗持久化。特别是南顺人与客家人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本岛，达到了相邻的马达加斯加岛。在马达加斯加，法国人于1896年颁布法令，强迫侨民组建“侨民协会”。每个县的侨民（主要是印度人与华人）只要达到十人以上，便要组建一个“侨民协会”（李 1986：214）。侨民协会类似中国传统社会的保甲制一样，起到一种联防与监督作用。侨民首领主持协会工作，其中包括接纳移民等事宜。南顺人利用这个权力，有效的拒绝了毛里求斯客家人的进入马达加斯加。（李 1986：215）。这就是导致后来毛里求斯以客家人为主，而马达加斯加是清一色的南顺人的原因。

（3）华商总会的建立

随着头人制度的瓦解，华人社会缺少了一位权威人物，所以行政当局与华人之间的传统联系也被破坏了。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被人们承认的合法组织，以便华人社会与毛里求斯当局之间进行对话。

就在此时，清政府开始在国内外建立商会，作为领导商人以及在海外处理华人事务的机构。毛里求斯的华人于1908年建立了自己的商会，1909年这个商会被承认。商会的成立，需要到清政府商部备案，所以海外社团组织已经开始具有半官方化意义。商会成立后，华人社会领导和调停的职权已经转移到华商总会。政府让商会负责审理移民档案并向警察局

申请入境签证。长期担任商会秘书的是客家人管仕康。他的职责就是保持华人社会与政府对话，使商会主席的决定得到政府公认。1946年，他被保举为华人社会的立法会成员，但他指定华人商会执行主席朱梅麟担任这一职务。

从早期的秘密会社性质的关帝庙到关官方性质的华商总会，华人社会经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团。经历了不同组织形态、不同管理方式。无论是关帝庙还是华商总会，都是代表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打交道的社团，但其组织形态有所不同。以关帝庙为代表的早期华人社团，带有秘密会社的性质，并且是华人自己内部自治的一个机构，虽也受到殖民当局的制约，但有很大的主导权，也是按照中国传统伦理模式而组织的社团。当转到关帝庙委员会以后，通过民主平等的方式运行，但事实证明其运转失效。最后是关官方性质的商会成立，才重新确立华人社会的权威。从头人制度到关帝庙委员会制度，再到商会，华人社会的权力开始从民间过渡给政府。这一系列变化，也可能发现，华人社团的发展，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制约，同时，国内的政治也对社团的发展发挥影响。

2.2 仁和会馆

19世纪晚期，毛里求斯主要以南顺人与客家人为主，一个客方言人群，一个是粤方言人群，二者之间长期隔阂相争，各自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其中客家人以仁和会馆为主，南顺人以南顺会馆为主。

清咸丰年间，广大客家人相继移民毛岛，使毛岛移民急剧增至1,500多人。为能彼此守望相助，他们成立了“嘉应同乡会”，（李 1996：无页码）。同治八（1869）年改为“仁和会馆”，但没有固定馆址。每年以祭祀地点和日期作为集散和议事地点，口头相约，由出席者摊推举总理和协理来管理。传统华人的会馆，往往是以寺庙为依托。于是客家人便另外建了一座关帝庙。随着华人数量增多，福建、南顺、客家三个族群为拉沙鳞的关帝总庙发生矛盾与冲突，相互斗争不已。前述一块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碑，其文之所以被破

照片 2　仁和会馆（2018年 8 月，笔者拍摄）

坏，据说就是客家人与南顺人发生冲突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1874），客家人集资兴建了一座关帝分庙落成，因为是关帝庙的分庙，取关平是关公之子之义，故俗称“关平庙”。关平庙也作为客家人“仁和会馆”的馆址。现在关平庙大门上仍题有“仁和会馆”四个大字。根据记，此次建仁和会馆的大总理为王雁宾。参与倡理者有三：朱炳、李梗光、王德禄[3)]。会馆内除祀奉关帝外，还另辟一室，祀奉客家人先人，往生先人的神位都放入其中，所以仁和会馆又有祠堂的功能。

据建馆碑文记载，同治十三年，岁次癸酉（1874），关帝生日那天，嘉应同侨仁和会馆总理王雁宾，协理朱棠，李梗光，王德禄等召集仁和同人，倡议设法建立圣帝庙堂。不久工程告成，额曰“仁和会馆”，民众称其为老会馆。1904年以仁和会馆名义正式向政府注册，此名沿用至今。

1905年，仁和会馆在路易港购买一座房屋，作为仁和同人过埠时驻足之处。同年10月，将其申请注册为“仁和旅馆”，还在院内设摊场和财神爷庙，并广招会员，重新订立会章，选举董事会。从此时起，“仁和会馆”和“仁和旅馆”被人们经常分别使用，其实两者是同一机构。1929年 4 月12日，仁和会馆通过决议，将仁和会馆与仁和旅馆两者合并，并规定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定期祭祀、集会的日子。仁和会馆的成立与发展，显示了毛里求斯客家人力量的崛起。

2.3 南顺会馆

南顺会馆成立于1859年。主要由来自广东南海与顺德两县的移民组成。在组建之初，称为“南顺公司”，1894年改名为南顺会馆。“公司”一词显示南顺会馆早期与秘密会社有关。1902年，南顺会馆扩大会馆，祀奉关帝，同时也与仁和会馆一样，祀奉往生先人，也有祠堂的功能。

除了南顺会馆，早期南顺人还成立了义兴公司。清末随着革命党活动的兴起，社团领

照片 3　南顺会馆（2018年 8 月，笔者拍摄）

袖阿方·唐文在当地华商的支持下把原来的“义兴公祠”改为“中和会馆”（李 1986：110）。义兴公祠即义兴公司或义兴会，为南洋华人私会党，其成员多为新会、肇庆等粤方言的锡矿工人或华人手工业者（周主編 1993：435）。南顺人说的是粤方言，他们成立义兴公祠就不难理解。中和会馆，应该是指中和堂，也是清末的一个革命团体。中和堂于1897年由兴中会会员尤列在香港创建，后在南洋各埠都建有分部，主要任务是为国内革命募集款项，代销《中国日报》等（周主編 1993：112）。综合以上两点史料，可以判断，南顺人应该是支持革命运动的。作为其对立面的客家人，从现有材料来判断，应该是支持清政府的。因为1889年，毛里求斯的商人似乎接待过一次清政府派出的密使（李 1986：147）。另外，从南洋地区大背景来看，清末以张弼士为首的客家富商集团与清廷有很好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毛里求斯客家精英。客方言群与粤方言群在东南亚的对立关系也延续到毛里求斯。

南顺会馆与仁和会馆，都具有排他性与族群封闭性。同时，又因为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这种族群隔阂又与政见上的不同相联系在一起，加剧了这种对立关系。

2.4 传统的宗亲组织

除了以方言为标准成立社团外，毛里求斯华人还以姓氏为中心成立社团。在毛里求斯，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宗亲会，这是家族制度在海外社会的延伸。这些宗亲组织通常有两种称呼，一是称“某氏旅馆”，如林家馆（林氏集义会）、张氏旅馆、霍氏旅馆、何氏旅馆等。另外还一种是以姓氏的堂号命名，称“某某堂”，如黄姓的江夏堂，李姓的陇西堂，胡姓的安定堂，陈氏的世昌堂，黎姓的致远堂等。这些宗亲组织除举行年节聚会，春秋两祭外，更重要的是因其有社会与商业上的实际用途。

早期华人店铺在乡村，需要定期前往路易港办货，客家人称其为“过埠”。因为路途遥远，需要在埠上过夜以及存放货物，所以需要一个场所，各个姓氏便修建了以自己姓氏全名的旅馆。几乎每一个姓氏，都在路易斯港口建立有旅馆，专门提供给来这里办货的暂时居住。在路易斯港唐人街上，有各姓的旅馆。如林氏旅馆，张氏旅馆等。最大的旅馆是仁和旅馆。这是仁和会馆在搬到唐人街之前而设立的机构，也充当供在乡间的人暂住的功能。

许多家族也通过唐人街上建的旅馆指挥家族商业网络，如“林家馆”便是这样。林家馆，又称“林氏集义会”，其祖籍地为广东梅县白宫阁公岭村，属于较早来到毛里求斯的姓氏之一，也是人数比较多的姓氏。林氏家族在唐人街购买白人的房屋，开办“林家馆”。据仁和会馆的会长林孟超介绍，他祖父曾坐镇林家馆，然后派其儿孙到山上或乡村里去开店。每个周末，各地林姓家族的人来到埠上办货，然后在林家馆歇脚休息。林家馆里有专人做饭，也有睡觉的地方。饭后，前来办货的人在这里休息或打麻将。后来，这种因为商业需要而形成的各种旅馆，又变成了小孩子读书寄宿的场所。一些在乡间店主的小孩要在路易斯港读书，他们便寄宿在自己姓氏的旅馆里。再后来，这些旅馆也渐渐发展成一个祭祀的场所。每年在固定的日子，一起到这里祭祀先祖，然后一起参加宴会。

有的宗亲组织是各地同姓宗亲联合起来的，类似传统的合族模式。这一点以李姓陇西堂表现最为典型。毛里求斯的李姓，来自多个祖籍地，分别为白宫龙岗、梅南罗田、长沙镇小密村。这些不同地方李姓原来有自己的宗亲组织。如龙岗李姓族人成立了“龙岗自治会”与“龙岗公所”，罗田的李姓创办了“罗田自治会”（又名“李家馆”）。1900年，三地李姓宗亲联合起来，购置馆所，申请注册，成立了陇西堂（笃 1987）。陇西堂会所也是每星期从山区来路易港办货的宗亲歇脚地。同时也接待往返南非、留尼旺等地同乡。

今天，随着新一代华人职业多元化，不再以开店为业，所以各个姓氏的宗亲会组织成为年节活动的场所，其实际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如林家馆老馆已经破败而废弃，另立新馆舍。新的馆舍出租给别人营业。而陇西堂馆大楼则用来开展文体活动，设立中文补习班等。

3 二战后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

传统的社团都是为了应付生老病死等实际问题而设，但当移民留居地的社会服务进一步发展，这些功能被社会取代时，华人社团也相应有了改变。

3.1 战后毛里求斯社会的变化

二战以后，毛里求斯华人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开始在殖民地着手公共服务改革，特别是教育、卫生、社会救济部门（李 1986：295），而这些服务传统上是由会馆提供的。殖民当局的一系列政策，取代了会馆这些功能，这开始让毛里求斯华人社会开始慢慢发生变化。社团、宗族间的互助的需要大大降低。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上，侨居地华人也有了改善。政治上，早在1948年，殖民

照片 4　毛里求斯李姓陇西堂（引自1987年《毛里求斯陇西堂八七周年新厦落成纪念特刊》封面）

当局就规定每个侨民社会在立法委员会中可有一名被选举或初委任的代表，毛籍华人因此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条件。毛里求斯独立后，华人与当地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不少人被委以重任，一些华人被选为议员、市长，有些还被委任为大使、部长（廖 1995：355）。经济政策方面，独立后的毛里求斯对于华人也有所改善。英国殖民者曾于1842年发布公告，禁止外国人占有或继承地产和不动产。该法令于毛里求斯独立后的二年废除。此外，战后无论是殖民政府还是独立政府都对华侨的经济活动未加限制与歧视，反而比较重视。文教方面，殖民当局和独立后的毛里求斯政府对华侨华人采取不干预不歧视的政策。华侨可以创办学校，出版报刊和组建社团。福利政策方面，战后初年的英国殖民当局通过多个社会福利计划，先后向家庭妇女、儿童、病人、失业者和老人发放社会福利金、失业金、养老金等。这些社会福利的实行没有种族区别，符合条件的华侨人同样可以享受（廖 1995：357）。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侨民开始开始实现在地化。早期过番谋生的华人本没有定居计划，目的只是挣钱养家，老了回家安度晚年。但事实上，随着在谋生地长年久居，特别是华人女性的移民的进入，开始组成稳定的家庭，并深受殖民地生活方式的影响（李 1986）。再加上当地政府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渐渐定居下来。具体到毛里求斯华人，他们从上世纪便开始渐渐加入英国籍。据统计，1944年，加入英籍的占57.6%，1962年加入英籍的占84.7%（龚 2003：178）。

1968年，独立后的毛里求斯推行文化多元政策，以保持政局的稳定。毛里求斯政府欢迎华侨入籍。在毛里求斯的 3 万多华侨华人中，90%以上加入了毛里求斯国籍，剩下的都是新近入境的移民。毛里求斯华人入籍后成为多元族群中平等的一员，享受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从英殖民时期到独立后的一系列对华人平等的政策，使得毛里求斯新一代华人开始渐渐脱离原来中国文化的环境，开始与这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上新一代华人出生在毛里求斯，与自己的祖籍国存在隔阂，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感到陌生。他们都视毛里求斯为自己的国家，认同更强。原来那种源自祖籍国的乡团观念已经淡化。海外华侨社会已经变为海外华人社会。这对于传统华人社团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再对传统的会馆感兴趣，而组建新的社团。

3.2 新式华人社团的成立

当今世界有关民间结社有两种主要体制，一是预防制，一是追惩制。预防制是指在组织团体之前必须严格审查，得到政府许可方可成立。追惩制则无需审查，但发现违法时给予追惩。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权运动兴起，多数实行追惩制。在实施追惩制的国家成立社团非常简便，只要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拟订章程即可成立。英国实行的是追惩制，毛里求斯法律脱胎于英国，也实行追惩制。在这种政策下，毛里求斯新社团的成立变得非常容易。

毛里求斯新一代华人成立社团不再以传统的地缘、方言、籍贯为标准，而是以在毛里求斯的生活经历为基础而形成，如共同的志趣、共同的经历、共同职业、共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政治倾向、相同的性别等。

根据共同志趣而形成的社团主要是文体团体，包括国乐研究社、蓝白健美会、长风体育会、海燕体育会等。根据共同教育背景而形成的社团主要是校友会，包括新华中学校友会、新中红旗同学会、新中黎明同学会、群星同学会、培英中学校友会等。有行业协会，如白酒行业协会、护商区分会、小商人协会、中文教师联合会等。还有性别的（李 2000：466）。另外，还有不同人群组成的社团，如以性别组成的社团，包括以妇女团体为例，有华人妇女会、冰威廉华人妇女联合会／龄联谊会、华光妇女联谊会——华光会、华晴乐龄会——华晴会、华人妇联会等。

在毛里求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也组成各自的社团。如由著名企业家成立的毛华协会。毛华协会，由著名企业家阙绍忠于发起，由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与著名人士成组成，于1991年成立。其宗旨是促进华人福利事业和团结工作，促进华人间以及华人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林 1995：39）。

另外还有一批受西式教育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创办的华联，也属于特殊社会阶层人士创办的社团。华联于1977年由华人知识分子陈庆㶽等发起成立，有产业与会址。“华联”，在英文名称中没有将其意译，而是直接音译成“Hualian”。在华联会址内部陈设中，除“华联”两字为中文外，其它一概为英文，有关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活动的海报也用英文书写。

3.3 战后社团的产生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化，年轻一代毛里求斯华人不再像传统老一代华人那样终日守着店铺讨生活，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自由与时间来组建社团，参与社会活动。这显示了毛里求斯华人社会活动的多样化与社会身份的多元化，体现了华人社会的进步。但具体到每个社团的成立过程，我们也可发现，毛里求斯社会社团众多，与华人社会内部的种种歧异也有关。

以校友会为例，同一个新华学校，有多个同学（校友）会。先是成立新中校友会，这是最早的一个组织，后由于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又另外组织了新中同学会、新中红旗同学会、新中黎明同学会等。又以妇女团体为例，1956年成立了毛里求斯华人妇女联合会，其宗旨是保护妇女权利，谋求妇女福利。观其名称，乃为整个毛里求斯华人妇女界所共有。但是，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冰威廉妇联会（1987年）、华光妇女联谊会、华晴乐龄会等。这些团体互不相统，从而形成社团林立的感觉。

有的社团是通过从母社团裂变而产生。如福禄寿联谊会（Fook Look Soo Senior Citizens Association），便是由仁会馆的几位董事于1992年 7 月出来成立的，林钦登等热心人士捐建了永久性会所。其宗旨为“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致力于服务毛里求斯华人社会中老年人群体。这个联谊组织每周举行四次集体舞会，经常举办卡拉 OK 观赏演唱会，每周日还免费为广大侨胞举办汉语培训班，丰富老年人的生活，组织老年人在本地旅游度假，

从不间断的参加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福禄寿联谊会（1992-2013）21周年纪念专刊》2013a）。随着汉语热的兴起，福禄寿又于2008年成立了汉语促进会（Chinese Speaking Association），以促进汉语的学习，其理事成员均为福禄寿的理事成员。其宗旨为“传播中国文化，便利汉语学习，巩固民族团结”（《毛里求斯汉语促进会2009年物刊》2013b：4）。这种由母社团裂变新社团的方式，是社团组建的另一种方式。这种裂变是因为要满足新的需求，如尊老、学习语言、传播文化等。这种方式导致许多社团的领导人物重叠。

与裂变方式不一样的是，从母社团分离出而成立的新社团，这里以社团联合会为例说明。目前毛里求斯最有影响的社团之一——华人社团联合会（Federation of Chinese Societies（Mauritius））其实是从仁和会馆分离出来的。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很大，部分董事于1988年脱离原来仁和会馆，重新组建社团，命名为华人社团联合会。其宗旨是“组织全侨性活动，推动华侨华人社团团结，促进华侨华人公益事业”。目前该会有24个团体会员，包括南顺会馆、广东会馆等，但其中没有仁和会馆，可见其与母社团的分歧。社团联合会与仁和会馆互相对立，常常在一些活动上竞争，互不相让。

李安山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非洲华人组织的聚合趋势有所加强（李 2000：466）。但实际上非洲华人对创办社团一直有非常高的热情。据笔者所接触的个案来看，近年来，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在还在增加。如一批热爱中文，热心传承中华文明的华裔于2010年组织了“文化流动协会”（Culture on move）。这是一个开放性、非赢利的文化团体。大概是2013年，又有一些人创建了“毛里求斯南顺与客家人后裔协会”。而上文中所例举的华人社团联合会，虽然名为“联合”，但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分裂的产物。

4 近代以来中国国内政局对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的影响

海外华人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延伸，这除了体现在文化上的延续外，还表现在政治上的互动影响。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开始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这些势力包括清王朝、保皇派、革命派以及后来的国共两党。海外华人社会开始与中国国内政治互相影响，同频共振，这是近代以来海外华人社会的主题之一。远在非洲的毛里求斯，虽是一个人口数量很小的华人社会，但国内政治的影响仍然波及于此，并对本地华社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如前文所述，在清末关帝庙领导权之争，虽然是族群对立的一个表现，但其背后也是清革命派与保皇派之争的体现。

由于实行民族主义教育，所以一系列与民族主义有关的社团成立。1909年，清政府提出“血统原则”，承认海外华人为中国公民，于是开始了民族主义教育。到上世纪20年代，海外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原则对海外华人进行教育。这对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有重要意义。这种情况下，一些带有民族主义的社团成立，如1925年成立的“中华民族俱乐部”。1927年成立的中国书报社。这个社团的宗旨是：建立以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化为主要课程的学校；建立供成年人阅读的图书馆；并建筑会议大厅传播中国文化（李

1986：289）。这些功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

二战以后，随着冷战的兴起，全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欧美为一方的北约与华约之间的对立，使得世界分成两阵营。中国国内的国共对立也是这种冷战格局下的产物之一。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对峙，海外华人社会也受之影响，侨团分成两派（李 1995：91-92）。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国民党沿着辛亥革命时期在海外形成人脉与政治轨迹，继续加大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国民党在非洲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兴中会。在杨衢云的推动下，南非成立兴中会分会，后兴中会可能成为中华革命党的一个支部，最后发展为中国国民党的支部。上世纪20年代初，南非、留尼旺、毛里求斯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分部。毛里求斯分部于1927年改组时改为直属支部。1928年，国民党中央对毛里求斯直属支部进行整顿，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李 2000：238）。这些在特殊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治组织，对于后来华侨的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国民党支部外，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对毛里求斯华人社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侨务委员会。1929年，侨务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管辖。1932年，复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侨务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积极开展海外工作。侨委会往往配合海外党支部一起活动。以华商总会来说，由于国共对立的政治因素，导致华商总会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有国民党背景的朱梅麟担任会长，所以其会员有一定的局限性（李 2000：461）。

从1911年到1936年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在非洲发展迅速，毛里求斯也是如此。国民党的力量深入到社团、学校等机构。特别是当时国民党背后有政府作为支持，使得其在华社中施加影响更加便利。二战之前，海外侨团成立时，除向当地国注册，还要向中华民国侨务部门注册。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二战后。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台当局积极争取海外侨团的支持，所以台湾对海外侨团存在着影响力。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于上世纪50年代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融入当地社会，所以影响较小。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左右两派斗争，成立了一些青年社团。这些青年社团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后来这些青年团体渐渐不复存在。

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开始建立侨务部门，对海外华侨进行管理。所以，1933年，新华学校被当时中国政府侨务会承认。在国民党活动同时，共产党也在毛里求斯有所活动。新华学校发生了左右派斗争，左派控制了新华学校，并于1941年在原有学校基础上扩建了新华中学。为了对抗，由中国国民党驻毛里求斯直属支部牵头，在路易斯港开办有一间中华中学，三间中华小学。另外，在荷精（Rose Hill）、鸠必（Curepipe）、埋布（Mahebourg）等地了开办有中华小学。但选择读华文人数越来越少，所以中华中小学到60年代都被迫停办（陈 1989：39），校董会也名存实亡。亲国民党的社团还包括中山学会、华侨青年活动中心、荣光会、南顺会馆等。对于关帝庙，也一直存在左右两派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关帝庙管理权为左派的华侨所有。后由地方法院裁决，又被台湾当局支持的华侨获得管理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8年。

左派与右派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仁和会馆。这场斗争导致1953-1969年仁和会馆的危机。仁和会馆较早便左倾。毛里求斯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便是仁和会馆升起的。1953年 4 月，会员大会改选。林迪长当选为会长，积极作为。 5 月 1 日，会馆购买喜炮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年 9 月，林迪长决定将仁和广场原有的旧建筑物拆除，以壮观瞻。接着，又指令司库支取大笔公款，将仁和广场改建为篮球场，既作为庆祝场地，又可发展青年体育运动，本意至善。但此举被当时的社会局局长却认为违背了章程：一是无偿地提供房屋给学校使用；二是支取公款购买喜炮庆祝国际劳动节；三是擅自拆卸公物和用公款改建篮球场。社会局认为这三点都是严重违反章程，拟取消仁和旅馆注册会籍，将其资产移交给另一社团管理。此令一出，华社哗然。仁和旅馆董事会觉得事态严重，急谋对策。一面聘请法律界人士，准备抗辩。一面又另起炉灶，即组织“仁和会”，以代替仁和旅馆接收其产业。

但当时仁和会馆内部出现不同的派别斗争。一部分会员思想右倾，在政治上亲台。他们在亲台的右派分子唆使下，于1954年一月向高等法院起诉，控告仁和会非法产生，不能接收仁和旅馆的产业。其目的在于打压早已左倾的仁和董事会，进而接管仁和，夺取公产。1956年，高等法院下令冻结仁和会馆的资产，暂由政府代管。于是双方争讼，迁延十余年，于1969年由高等法院宣判仁和会馆获胜，发还产权，保全了仁和会馆先贤置下的产业。这场危机看似违反了社团章程，但其背后的左右派别斗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源自国内的政治派别斗争长期延续在毛里求斯华人社团内部。

台湾当局还在毛里求斯派驻中国国民党驻模里西斯直属支部，有完备的组织系统。在当地吸收当地侨胞入党，同时也协助侨团开办各种活动，以推动侨务与党务工作。上世纪60年代，蒋介石在台湾提出“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以延续在大陆南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同时与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蒋介石亲任会长。在此号召下，台当局于1968年在毛里求斯创办的中华文化中心，其宣称目的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促进全侨团结和谐等工作。朱梅麟曾一度任中华文化中心的主任（陈 1989：40）。一直到1988年，中国大陆在毛里求斯建立第一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中国文化中心（China Cultural Centre, Mauritius），这是毛里求斯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机构。1988年 7 月 1 日在路易斯成立，进行中国文化传播活动。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在当地更具影响力。

在毛里求斯独立当年，国民党在毛里求斯成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组织便是客属会馆（Hakka Association）。客属会馆是胡文虎的推动下的一个客属社团，早期东南亚等主要城市均创办有分会，在东南亚，一般称客属公会。后来，客属总会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在其推动下，许多海外商埠都有成立客属会馆。1968年，在国民党推动下，毛里求斯也成立了客属会馆，吴玉华任首届会长。1986年，在国民党华侨救国联合总会理事非洲区理事、非洲区侨选立法委员谢达寿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曾经于1986年还举办了第八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能够在一个小小的岛国举办这样一次盛会，与国民党的支持有相当大的关系。1989年，客属会馆建筑馆址，台当局的侨务委员会也捐重金支持。以后的扩建与修建，台当局的侨务委员会都有所参与。而会馆的领导，也被侨务委员会聘为顾问。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从清末的革命派与保皇派之争，到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到国共内战，再到二战以后冷战大格局下的国共对立，都直接影响到毛里求斯的华人社会。

5 新时期社团功能的演变

毛里求斯独立以后，华人社团的功能与社会活动相应产生了变化。一方面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一些重要的社团活动受到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一些主要的社团，如仁和会馆、华人联合会等。

5.1 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以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十八华诞为例，时任毛里求斯总理、总统、艺术文化部长、青年体育部长等都写祝词，并刊登在会刊前面几页（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 2006）。仁和会馆也是一样，在庆典会刊中，一般前面都是总统、总理、部长的贺词，接下来是中国大使馆的贺词。这说明社团已经充分融入当地所在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融入主流社会。

现社团日常活动主要体现在各类聚会或庆典，各个社团活动内容也日渐趋同。以华人社团联合会为例，我们检索1989-2006年的大事记，发现其主要的活动有：接待中国来的中央与地方访团体、欢送与接待上任的外交官员。给老人发放红包、庆祝华社重要事件如获勋、获得官费留学等。此外还有赈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春节文艺演出等（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 2006）。其中以接待来访较多。这与传统会馆或社团功利性、或保护侨民的功能在弱化，只是象征性的在年节发放红包与慈善品。发放红包，这是传统会馆恤患难，济贫困传统的延续，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了。

客属会馆这种带有明显政治性的会馆，也在活动上偏向传统的会馆，以此来凝聚人气，彰显自己的存在。他们的活动包括：（1）每月分发老弱贫侨补助金；施棺赐药；每年表扬华裔大学官费生，举行祝贺欢宴；每年春节分发敬老红包；每年举行元宵敬老欢宴；成立录影带欣赏会；举办“香功练习”，供老人予以、强身健体机会；中秋节举行中秋敬老送礼活动，分赠月饼糖果礼物予年老同侨（钟 1998）。

仁和会馆也是一样。在庆典的記念刊中，一般前面都是总统、总理、部长的贺词。接下来是中国大使馆的贺词。以1996年125周年纪念刊为例。其活动也包括每月发放老弱贫侨补助金；举办春节欢宴老弱同侨并发放红包；支持华侨文教事业，开设仁和舞蹈班，多次举行汇报演出；每年设宴庆贺华裔大学官费生，获封衔授勋的杰出青年及侨社知名人士。对外，则接待祖籍国友好访问，文艺团体及体育代表团等。

另外各姓的宗亲会也在改变。宗亲会是基于家族组织传统而成立的社团。宗亲会每年举行春秋两祭，然后一起聚餐交流。多数家族都建立有互救会，以赈济每个困难的成员。

这些功能随着英殖民政府公共服务改革以及社会救济的推行，导致传统家族或以寺庙为依托的社会团体功能开始松动与瓦解，到了今天，这些机构多是年节相聚的场所。

5.2 中国文化的展示

当然，华人社团仍然具有其族群性。这里的族群性主要以其作为“华人”的身份而体现。传统会馆中，不同祖籍地的族群之间有隔阂。加入当地国家国籍后，土生土长的华人比例迅速攀升。法律上，华侨社团已经成为当地国家的社团，华侨已经成为本国公民，所以祖籍地的意义越来越微不足道，他们更多是以“华人”的身份获得认同，而不是客家人或广东人。这种身份认同，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更容易得到彰显。这样，传统会馆便超越乡邦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来与祖籍国交流，不再有像以前只见乡梓，不见国家的状况。因为会馆已经上升为祖籍国外交实践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接触到往往是代表国家的公职人员或官員，这超越之前以联系乡谊为主功能，从而实现了将移民心态上升为充当所在国与中国友谊桥梁的责任（李 1995：217）。

作为族群意义上的华人，与中国国内建立联系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一是协助中国外交，二是参加中国赈灾活动。一些社团也是中国外交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重要的华人社团，也是祖籍国外交所依靠的社会团体之一。以华人社团联合会为例，它既是本国的社团，与当地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华人社团联合会成立于1988年10月 2 日。同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9周年。成立后第一个活动是同年10月 8 日，接待中联部非洲局代表团一行四人。另外，反“独”促统也成为华人社团的工作之一。正如时任驻毛里求斯大使高玉琛在华人社团联合会18周年贺词中所讲的一样：“贵会在团结广大侨胞融入主流社会、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与祖籍国的联系、反独促统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 2006：17）。

仁和会馆也与祖籍国保持友好。除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中国外，曾发起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签名活动；也曾向梅县水灾、云南地震等自然灾害受灾者捐献款赈灾（刘攸宪）。

传统华人故土情结非常浓郁，从清末以来延续的国家效忠观念一直在传统侨社中存在。加入当地国家国籍后，土生土长的华人比例迅速樊升。法律上，华侨社团已经成为当地国家的社团。但是，传统社团仍然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不可割裂，祖籍国仍然是他们所关心的对象，中国自身的表现影响到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感情（李 1995：142）。

5.3 走向世界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在原移居国的华人又主动或被迫迁移，毛里求斯情况也一样。毛里求斯华人的迁移有多重原因。1960年，当时英国殖民政府修改宪法，将选择举扩大至任何文化水平的成年人。这样投票权的人数大大增加。因为在毛里求斯，印度裔占最大的比例，所以随着1968年独立的临近，许多华人担心毛里求斯会产生一个由印度裔掌控的政府，于是举家移民到欧洲、北美洲及澳大利亚。

另一个再次移民的原因是毛里求斯地方狭小，发展空间有限，为了生活，华人再次迁移，其目的地主要是加拿大、欧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首先是欧美留学的华人子弟留在当地工作、定居、入籍。毛里求斯是英联邦国家，所以他们在英联邦国家的迁移具有政策与语言的便利性。许多华人子女送到欧美国家读书，然后在当地工作、定居、入籍，这样他们实现了第二次迁移。只是每到年节或者扫墓时才会回到毛里求斯。毛里求斯已成为他们的故乡。

目前毛里求斯常居华人数量只有1.5万左右，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减少。这对于社团发展是不利。现在一些传统社团都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不感兴趣。但从毛里求斯移民到海外的华人数量可观。据说英国有数千人之多[4]，另外加拿大也是毛里求斯华人的一个重要移居地。据印度华人组建的印华会馆会长陈照华先生介绍，他的毛里求斯朋友李昌兴曾在多伦多组建毛里求斯旅加拿大华人会馆[5]。但这些移居海外的毛里求斯华人如何在海外组织新的社团还需要观察。

另外，当代世界性华人团体的建构成为新的趋势（李 1995：130）。主要体现在以姓氏或族群、信仰（如关帝信仰）的方式，参与建构世界性华人团体。因为毛里求斯主体是客家人，所以客属恳亲大会（1971年）就成为他们认同自己身份的一个重要场合。这种基于族群认同而形成的世界性华人社团组织还有，如世界嘉应同乡联谊大会，它也是世界性的客属组织。此外，就是各种姓氏的宗亲会，如全球李氏宗亲会、世界黄氏宗亲总会。这些宗亲会在世界各地举办恳亲大会，例如，第十一届第一次恳亲大会便于2011年12月 3－4 日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举行[6]。毛里求斯华人积极参加这些世界性社团的活动。其中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毛里求斯社团每年组织人员参加。这一来可以彰显族群特色，二来可以很好地加强联谊。

6 结语

社团是华人社会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华人社团的变化，其实也是华人社会变化的缩影。在传统时代，社团是侨民的庇护所。当侨民变成国民以后，华人社团便拥有了新的变化。随着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迁，华人社团也在不断的变迁。变迁的动因有内部功能需要与外部环境两个层面。

从内部功能上而言，随着居住地国家的法律政策的变化。早期社团是解决从原乡来客地谋生所遇到的问题，其并非以主人的心态来看待一些事。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些社团发生变化。从最早的庇护功能的场所，变成具有交际功能性质的机构。其组建比较便捷，会员的构成也超越了地缘与血缘，而是根据自己的原则而组成。

从外部环境来看，社团的出现，还与时代政治局势有关。冷战后的世界格局的，也是影响毛里求斯政见不同的社团产生的一个因素。内部其它分歧也是导致毛里求斯社会社团多元的一个重要因素。

华人社团在多元的社会里，也肩负展示自己文化责任。1991年，唐人街文化协会成立，其主要功能是负责年节时各种文化表演活动。华人社团联合会还成立“春节委员会”，专门负责文艺演出活动。从2004年起，华商总会与路易港市政府、中国文化中心及其他华人社团合作，举办唐人街饮食文化节。

华人社会社团组织，是随着不同时代的需求而产生的，有的社团虽然历史悠久，名称也没有改变，但其主要活动还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随着时代的改变，一些新的社团又出现。他们代表华人社会新的需要与追求。

总之，随着时代变迁，新的问题与要求不断出现，一些会馆面临改革。华人社团，特别是一些老的传统社团，已经不再被年轻人青睐，他们对于华人社团也不再感兴趣。现在传统社团的成员多是老人，少有年轻的力量参与其中，将来这些社团如何发展，值得我们观察。

註

1）如施坚雅在考察泰国的华人社会时，便多会馆领袖入手，考察社团的权力结构。如施坚雅在关于泰国华人社会研究中，便从社团领袖入手。他发现社团领袖人物往往身兼数个社团领导，这被施坚雅称为“理事联锁”（interlocking leadership）现象。
2）以2005-2006年度的董事会成员为例。福建董事：陈福来、陈安宏、陈阿摩、杨宗贵、洪则亚、洪椰即、洪呵浪；南顺董事：霍自强、霍远塘、霍忠宁、邱耀光、刘国栋、刘国荣、黎广来；客家董事：刘国宪、刘增洪、朱清球、朱长坪、熊仕中、曾繁兴、田禄芳。见毛里求斯关帝庙内碑文。
3）见《鼎建仁和会馆捐题殷实并会底各各善信芳名碑》，毛里求斯。
4）见毛里求斯 Jacques K. Lee 女士写给笔者的邮件，2018年 1 月 8 日。
5）此为加拿大多伦多印华会馆会长陈照华先生2018年12月告诉笔者的信息，他说在他曾协助毛里求斯客家人李昌兴成立了一个会馆。但其实际运作情况不详。
6）见 Kwong Ha Tong Wong 100th anniversary《江夏堂黄100周年特刊》，毛里求斯，2012年。

参照文献

〈中文文献〉
陈英东
1989 《模里西斯华侨概况》台北：正中书局。
笃才
1987 陇西志《毛里求斯陇西堂八七周年新厦落成纪念特刊》路易港：毛里求斯陇西堂，未编页码。
段颖、陈志明
2013a《福禄寿联谊会（1992-2013）21周年纪念专刊》路易港：毛里求斯禄禄寿联谊会。
2013b《毛里求斯汉语促进会2009年特刊》路易港：毛里求斯汉语促进会。

2017　跨洋流动、地方适应与中国联结——毛里求斯华人社团与社会探析《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 92-104。

龚伯洪（编著）

2003　《广府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安山

2000　《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明欢

1995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卓凡

1986　西印度洋华侨史，方积根（編）《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

李济祥

1996　仁和会馆建立史话、仁和会馆（编）《毛里求斯仁和会馆建馆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廖小健

1995　《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林金枝

1995　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八佳侨史》1995年第2期: 36-40。

刘小龙

2012　《海峡关帝传奇》福州：海风出版社。

刘攸宪

2006　继承传统，发扬光大——为纪念仁和会馆成立125周年而作《毛里求斯仁和会馆建馆一百廿五周年纪念特刊》路易港：毛里求斯仁和会馆。

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

2006　《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十八周年纪念刊》路易港：毛里求斯华人社团联合会。

梅显仁

1997　非洲华人社团的变迁《侨园》1997年第6期: 42-43。

莫次南

1930　亚非利加洲华侨概况《南洋研究》（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3(2): 45-56。

周南京（主编）

1993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钟奖章

1998　回顾与前瞻——为庆祝模里西斯客属会馆成立卅周年纪念而作《模里西斯客属会馆成立卅周年特刊》路易港：毛里求斯客属会馆。